

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

读《梁启超家书》，总被这位父亲的细腻与通透打动。他会因收到子女的来信“手舞足蹈”，会用“我的宝贝”“老白鼻”这样亲昵的称呼包裹爱意，却从不在溺爱中遮蔽子女的双眼——反而将“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”这句箴言，化作子女成长路上的灯塔。

01 以忧患为“玉成”

1916年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霾笼罩中国，梁启超毅然投身护国运动，他的家庭生活也因此陷入了动荡之中。但他在给长女思顺的信中，却写下了令人振聋发聩的句子：“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，能使人精神振奋，志气强立。”

彼时的他，早已在安与危的对比中看清真相：前几年生活优渥，竟不自觉“德业日退”；如今重归忧患，心境的愉快反倒“不啻天壤”。他特意叮嘱思顺将信转给思成、思永，直言这是“天之所以玉成汝辈”——他怕的不是子女吃苦，而是怕他们在安逸中消磨斗志，丢了梁家“十数代清白寒素”的底色，沦为不知人间疾苦的纨绔子弟。

一个月后，他再次致信子女，重申《孟子》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的古训，坦言“汝辈小小年纪，恰值此数年来无端度虚荣之岁月，真是此生一险运”。甚至在护国运动成功后，他决然选择“不再仕宦”，只为让子女“常育于寒士之家庭”，在清贫与磨砺中学会自立。

02 视困厄为“学校”

梁启超的“忧患教育”从非空泛说教，而是落在子女生活的每一个实处。1927年，长女思顺随丈夫在加拿大领事馆任职，因北洋政府断了经费，一家六口的生活瞬间拮据。梁启超没有急于伸手接济，反而写信宽慰：“你们缩小生活程度，暂在坎挨一两年，是最好的。”

他提醒女儿莫忘“寒士家风”的本色，认为“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，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。至于快乐与否，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。”更将当下的窘迫视作成长的契机，希望女儿“拿现在当作一种学校，慢慢磨炼自己。”

在他眼中，苦难从不是用来抱怨的，而是用来修炼的。他教思顺夫妇在缩减开支中守住本心，更让他们明白：这份“苦”也是对孙辈的教育——只有亲身经历过困境，才能真正懂得坚韧的意义。

03 以自身为“镜鉴”

梁启超从不要求子女做自己做不到的事，而是以一生践行“忧患养人”的道理，将自身经历化作子女“最有力之精神教育”。

早年流亡日本，他“贫彻骨”却“为学日有常课”，哪怕“拂逆之事亶亶不知所届”，仍能心境旷怡“其乐乃无极”；辛亥革命后回国，百事缠身，一天接见上百位访客，却笑称“吾性惟劳乃乐”，将为国奔走视作分内之责；护国运动期间，他潜回西南联络反袁力量，一路艰险困顿，却自省“频年佚乐太过，致形骸不堪剧变”，把辛苦当作学养不足的警醒。

他还特意将护国运动期间的《从军日记》寄给思顺，叮嘱“此记无副本，宜宝存之，将来以示诸弟”。日记里的曲折与艰辛，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功绩，而是为了让子女看见：真正的强大，从不是避开风雨，而是在风雨中守住精神的丰盈。

04 传家风于血脉

梁启超的“忧”，从来不是个人的悲戚，而是与家国命运、子女未来紧密相连的深沉责任。他怕子女在安乐中失了斗志，更怕他们在乱世中丢了担当，而这份教诲，最终化作了子女血脉中的力量。

后来的岁月里，梁思成在战火中带着古建筑测绘工具辗转西南，贫病交加仍坚守学术，为中国建筑史留住火种；梁思宁中断学业投笔从戎，在新四军的艰苦岁月里淬炼出“再苦能比当亡国奴苦吗”的勇气；梁思永顶着物资匮乏的困境，成为中国首位接受西方考古学训练的学者，开创了我国考古事业的新局……正如次子思永所说：“我们弟兄姊妹都受了爹爹的遗传和教训，不会走到悲观沉郁一路去。”

05 结语

如今再读“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”，才懂这句话从不是对苦难的美化，而是一种清醒的生命智慧：忧患是打磨心性的磨石，是让人在风雨中站稳脚跟的底气。梁启超用一生践行，也用家书传递。这份藏在爱与责任里的箴言，至今仍在告诉我们：别怕眼前的难，那些打不倒我们的，终将让我们长出更坚韧的担当。

END